

# 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文化教育活动<sup>1</sup>

杨孝容

**【摘要】**：梁漱溟基于其独特的文化哲学观，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形成注重乡村的文化教育思想并付诸实践。本文通过回顾梁漱溟在重庆特别北碚进行的文化教育活动，阐明了其不离乡村的社会本位大教育思想，揭示了他对重庆及北碚文化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梁漱溟，文化教育，乡村建设，勉仁学校，重庆北碚

**【作者单位】**：重庆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政治学研究所，重庆 400020

梁漱溟先生素来重视乡村建设，并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理解，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率先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提出著名的乡村建设理论，并在山东邹平进行了八年乡村建设的实践。后因抗战爆发而移师川内，遂与重庆、与北碚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重庆尤其北碚在梁漱溟的人生历程中相当重要。他从 1937 年夏首次来到重庆，至 1950 年前往北京，十余年间主要居北碚，其间虽曾去香港，并在广西约三年，但所办文化教育事业仍由其师友团队在北碚坚守，未尝中断。这期间梁漱溟先生在重庆特别北碚所从事的文化教育活动，主要分助力乡村建设和兴办教育、讲学著书两大块。

一是助力乡村建设，即襄助重庆的乡村建设教育与北碚嘉陵江三峡实验区的乡村建设运动，时间段主要在 1937-1940 年，先是 1937 年 6 月受邀到四川乡村建设学院讲课并在川内（首站为重庆）演讲，其间也曾被请到北碚嘉陵江乡村建设实验区演讲，后又于 1940 年 1 月再次到北碚视察实验区的乡村建设；二是兴办教育并讲学著书，所办勉仁系列学校，即勉仁中学、勉仁书院（初在璧山，后迁北碚），与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及在此基础上创办的勉仁文学院，并在书院和学校开讲中国文化要义，撰写专著。时间大致在 1940-1950 年。其间，1941 年经桂林前往香港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1942-1945 年居广西，最早便是在广西大学开讲“中国文化要义”课程，成为后来在北碚讲课著书的先导。

上述贯穿其中的都是梁漱溟先生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对中国社会认知基础上的乡村文化教育理念。就其乡村建设理念及实践来看，所谓乡村建设，实则为改造乡村的文化教育活动。当前，我们在城乡统筹特别是乡村文化建设中出现诸多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梁漱溟先生的乡村文化教育理念及其实践仍有现实意义，值得重温。

## 一、助力民国重庆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乡村建设派的理论先驱和主要代表人物。1937 年 4 月 29-30 日，四川省立教育学院<sup>①</sup>高显鉴院长前往邹平参观<sup>[1]</sup>，随即代表四川省政府邀请梁漱溟先生入川演讲，并在该院讲课。与此同时，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亦曾屡次致电邀请梁漱溟先生赴川讲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先生以山东院方事务待理，又兼拟向院县工作人员讲解乡村建设理论，即复电约于 5 月 20 日左右始能前往。<sup>[2]</sup>尔后，梁漱溟先生如期于 5 月 19 日离开邹平，辗转四地，6 月 2 日始从汉飞渝，住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内<sup>②</sup>。梁漱溟先生是第一次到川内，曾说他此次主要是应乡村建设学院（即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所请来讲课的<sup>[3]</sup>，因此在重庆时就由该

<sup>1</sup>【基金项目】：2015 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汉藏教理院与民国佛教研究”（批准号：15BZJ012）。

<sup>2</sup>①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其前身为创始于 1932 年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1936 年，教育部以建院组织规程与大学组织法及大学规程不合，乃令改组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名称虽异，实质仍以研究乡村建设学术、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实验乡村建设工作、推进乡村建设事业为主旨。1937 年该院已更名，但《梁漱溟全集》第八卷所收录 1937 年日记仍注高显鉴为四川乡建学院院长。该院建院伊始即礼聘梁先生为该院指导顾问，其初创也主要得力于梁漱溟的学生王平叔、张俶知、赖钧伯等，办学理念、教学计

院接待。

据当时的报刊记载，1937年6月上旬梁漱溟先生在重庆至少进行了6场演讲，留下记录稿的仅3场（其中两场的讲稿未收录进全集），在民生公司所讲载于其公司内刊《新世界》上。

1937年6月4日上午在四川省教育学院演讲或说讲课，暂未寻获讲稿记录，想来亦为乡村建设方面的主题，下午则应民生总公司之请讲了《我的过去与山东工作概况》。开讲前，演讲主持者赖彦于介绍中说到：

“谈到复兴民族，对于乡村建设工作，便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乡村建设专家梁漱溟先生，这次到四川来，对于四川的乡村建设，想来帮助一定不小。”

可见，梁漱溟先生当时作为乡村建设专家的声望之隆。梁漱溟先生在演讲中说山东的工作主要有三项：第一项是研究——研究乡村建设的方案；第二项是训练——训练人才来干乡村建设的工作；第三项是实验——试验他们研究出来的既定方案。1933年以来还增加了县政工作的实验，也分为三项：第一项是一县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如户籍调查、人事登记、财政整顿、田赋清理以及教育卫生等等。第二项是地方自治。梁漱溟先生说中国的地方自治，远在三十年以前就有提倡，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地方成功，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值得研究的问题，要由研究，然后才能由乡村自治达到县自治的阶段。第三项是社会改进。如文盲的扫除等等。<sup>[3]</sup>

1937年6月5日在重庆青年会对中等学生讲演《略述乡村建设运动要旨》<sup>①</sup>。1937年6月6日在巴县女子中学全市校长教育座谈会上讲演，6月7日在川东师范学校讲演，但这两场暂时也未找到演讲记录。<sup>[4]</sup>此外，6月上旬梁漱溟先生还曾在重庆大学讲“日本的乡村工作”，在讲了日本的乡村工作现状后，又比较了其与中国乡村状况的异同。这场虽有记录，但不清楚讲的具体日期。<sup>②</sup>

1937年6月9日乘飞机前往成都，与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面谈。当时省府指定委员兼民政厅长甘绩镛专任接待，在省府联合总理纪念周、省府行政研究会、省党部、绥靖公署军官训练班、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处连续讲演多场，9日到达当天即有一场演讲，之后从10日到14日均是上下午各一场，16日上午前往新都实验县并在县府演讲，下午仍回成都演讲。所讲多与教育、乡建及当时的时局相关。讲辞经记录整理后，曾以“梁漱溟先生讲稿”为总题集中刊发于《四川教育》1937年7-8期合刊论著栏<sup>③</sup>，共13篇，其中在重庆讲的仅收录1篇（另五场所讲均未收录），在成都讲的有12篇（在新都讲的未收录）。题下有编者按云：

“梁漱溟先生，于六月间来川，对于乡村建设问题，演讲阐发，至为宏博，所有各次讲稿，兹经梁先生校正寄到，爰于本刊论著栏全部披露，以飨读者”<sup>④</sup>。

划、研究实验办法均取法于梁所办山东乡村建设学院，后亦多受梁漱溟影响。梁也很关心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的发展，与之关系一直比较密切。详见杨孝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念及其在重庆的影响》（《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11期）。

②相关记载见《梁漱溟全集》第八卷1937年日记正文及当页注释（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7页），但原注写为“四川乡建学院”，现更正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后文源自此处者不再一一作注。另，参见高泳修（高显鉴字泳修）《漫游记残》（《现代读物》1937年第2卷第33-34期合刊6-7页）与乡运消息报遗《梁漱溟先生应刘湘电请赴川讲演乡村建设理论》（《乡村运动周刊》1937年5月24日第8期13页）。

③见梁漱溟《我的过去与山东工作概况》（周仁贵记）（《新世界》1937年6月第10卷第11期，第4页），梁先生讲演中仍习惯性称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为“乡村建设学院”，自注其日记时也是这样。

④①《略述乡村建设运动要旨》原载1937年8月出刊的《四川教育》7-8期合刊，后据此收录在《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61-965页），注明是1937年6月4日在重庆青年会对中等学生讲。但此稿早于1937年7月12日即已

---

之后，梁漱溟先生于1937年6月20日再飞回渝，直到6月29日离渝，仍住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内，助其规划一切。然则，梁漱溟先生1937年6月下旬再返重庆后在该院讲课或在他处讲演情形，仅留下北碚两场讲演的记录，其他未见记载，亦无其他记录稿传世。

北碚的这两次演讲记录稿与相关报道皆刊载于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办的《北碚》月刊第1卷第12期（1937年8月1日出刊）。

1937年6月26日，梁漱溟先生受邀到北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视察，由重庆乘船前往北碚。梁漱溟先生是乡村建设专家，多年来倡导并亲身致力于推进乡村建设。北碚是卢作孚创办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署所在地，对他的到来特别重视，实验区区署提前几天就召开了各机关团体负责人会议，筹备盛大欢迎。当梁漱溟先生抵达北碚码头时，他看见炎炎烈日下，竟有兼善中学、北碚小学师生及民生公司水手队与实验区署职员400多人，由卢子英区长与兼善中学张博和校长带领，在嘉陵江边热情迎候。梁漱溟先生深受感动，下午的欢迎会上先对大家致谢，随即发表主题演讲《乡建的二大意义与知识分子下乡》。

梁漱溟先生说，北碚的嘉陵江乡村建设实验区所做的乡建工作与他在山东邹平县进行的乡村建设，都是往同一方向上努力。他强调，乡村建设有三大意义，这三大意义也即知识分子下乡的意义所在。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要知识分子下乡，第一做到“内外沟通”，让世界上的新知识新技术，包括“中国沿江沿海各大商埠”的新信息新事物送到中国，送到中国内地，送到中国的乡下；第二促成“上下沟通”，“上”即上级政府、有知识文化的人、有钱的人，“下”即穷人、没知识的无权的人，“上”“下”要相沟通；第三是宣达农民的痛苦，并能扩展其视野，成为乡人的耳目和喉舌。梁漱溟先生总结说：如果内外不沟通，国与国间不生关系；沿海与内地不沟通，形成隔阂局面；都市与乡村不沟通，失了联系；上下不沟通，只有虚空的眼光、没有实际力量；农民的痛苦不宣达出来，根本问题没法解决。所以这些都很有必要，乡村建设必须得做到这三点才行。梁漱溟先生还希望，知识分子能通过这样长期坚持不懈的乡村建设工作影响到政府，进而转移中国大局。这就是他主张的温和“革命”。<sup>[5]</sup>

6月26日晚，梁漱溟先生又在温泉茶话会上作了题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演讲。

一是讲中国的政治体制决不能跟着西洋走。梁漱溟先生说，一般迷醉于西洋的物质文明及政治组织者，莫不想现成地把它搬运过来，以维持中国社会崩溃的情势。这不但是不适合，而且也决不可能，因中西文化发生的背景迥有差异之故。

二是讲中华民族具有人生向上和伦理情谊两种特殊精神。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秩序就完全是“情”“理”维系着，将社会标准放在各个人心中，惟因各自消极节制、彼此调和妥协，缺乏团体生活，故发生“散漫”“被动”两种毛病。

---

在《乡村运动周刊》15期刊出，注明6月5日在重庆青年会讲，由江易桦笔记整理。另据当时陪同梁先生入川的席朝杰（杂志误作席晁杰）致函《乡村运动周刊》（1937年6月21日12期），亦说是6月5日在青年会演讲，并且，与《乡村运动周刊》相比，《四川教育》及《梁漱溟全集》收录的讲稿文字及断句标点都有讹误，日期出错的可能性也较大，故作订正。

②日本的乡村工作：梁漱溟在重庆大学讲演，《四川省政府公报》1937年6月11日第83期附录，99-100页）。席朝杰致《乡村运动周刊》函对梁先生在重庆的行程安排所述甚详：“自六月四、五、六、七日留重庆共四日，上午整个在教育学院讲演，下午入城在各地讲演，计第一日民生公司，第二日青年会，第三日巴县女子中学全市校长教育座谈会，第四日川东师范”，未提及在重庆大学讲演，未知是否信发出后新增的安排，因席的信中说6月8日飞成都，但据梁漱溟日记实则9日才飞成都，或许是8日在重大讲演。

③这批讲辞从1937年7月12日起亦有多篇在1937年4月山东创刊的《乡村运动周刊》上刊发。

④该期《四川教育》论著栏除13篇讲稿外，另有《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载于1937年8月9日出刊的《乡村运动周刊》19期上，文末注写作时间为1937年8月3日，为新撰著文章，非6月在川内所讲。

三是讲为要解决这两种问题，应发挥人生向上、伦理情谊两种精神，组织团体、运用科学，以创造新文化、建设新社会。这是因为，要增进中国社会的组织，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习惯背景，发挥中国民族固有的道德：以伦理情谊的精神，互以对方为重，个人要尊重团体（先要有个人对团体的义务，以提高团体的地位），团体亦要尊重个人（凡是团体的事情让大家自己来干，发展人生向上的精神，使大家自觉地积极参加团体的一切活动）。故个人尊重团体，可治散漫的病；团体尊重个人，可治被动的病。<sup>[6]</sup>

梁漱溟先生 1937 年 6 月首次入川，前后在重庆停留半月余，留下记载的至少有 8 场演讲（实际应有更多），其中传下记录稿的仅 5 场，这些演讲，主旨与他之前发表的《乡村建设理论》等相同，都集中反映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独特体会与认识，对乡村建设的一贯重视，同时还传达出身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强烈使命感。其中，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及重庆大学等处的演讲以及他此前的乡村建设实践影响到重庆的乡村建设教育；而在北碚的两次演讲因是专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人士所讲，其针对性也就更强，更具指导性，对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事业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该实验区的乡村建设实践在民国各乡村建设实验中历时最久，也可说最为成功，北碚一度被誉为“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卢作孚、卢子英兄弟特别卢作孚诚然居功至伟，另一方面也与他们践行梁漱溟先生的乡建理念相关。前述梁漱溟先生首次到重庆的第一场演讲即在重庆民生公司所讲，后来也曾多次受邀到民生公司演讲，如留下记载的就有 1938 年 8 月在民生公司朝会上的演讲。<sup>①</sup>可见梁漱溟先生与卢氏兄弟的联系以及对其事业的影响并不限于嘉陵江三峡实验区的乡村建设与勉仁学校的兴办，而是旁及其他各方面。

此外，1940 年 1 月，梁漱溟先生曾带两个儿子到北温泉休假，当时他已是国民参政员，遂借便对嘉陵江三峡实验区的乡建事业又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sup>②</sup>其间还上缙云山参观汉藏教理院并在那里作了一场演讲，题为《我的过去》。该演讲随后由汉院学生心月、德勇、明照三位合作记录整理，并经梁先生亲自校阅后，刊载于《海潮音》杂志<sup>[7]</sup>。这是他第一次到汉藏教理院，据文中所谈：他很久就知道汉藏教理院，早就想来参观，但以前他每次到温泉（北碚）来的时间都很短，顶多一天半天，这次到温泉来有十多天的停留，故能有汉院之行。可见，在勉仁中学迁到北碚之前，梁漱溟先生并非只在 1937 年 6 月下旬一次到北碚，而是多次到北碚，但在那里呆得最久的恐怕只有 1940 年初的这次。因时间充裕，故此不但得以全面考察嘉陵江三峡实验区，也了了上缙云山参观汉藏教理院的夙愿。

## 二、兴办勉仁系列学校并讲学著书

梁漱溟先生兴办的勉仁系列学校包含勉仁中学、勉仁书院、勉仁文学院及其前身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勉仁有“勉以行仁”之意，初时有“勉仁斋”之称，见于梁漱溟 1925 年所写《思亲记》<sup>[8]</sup>，指当时他在清华园内的借住之处，尔后演变为指称师友同处共学所在，再往后，又演变成师友团体代名词。勉仁书院则是以勉仁斋师友为主干方得成立。

1926 年起，“勉仁斋”师友团体先后随梁漱溟先生附托于广东省立一中及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1937 年 6 月，梁漱溟先生受四川省府主席刘湘及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显鉴之请入川，与刘湘面谈时曾商议将来在南充创设省立民众教育馆。未久抗战爆发，山东乡建院的勉仁斋同人随即从邹平撤入四川。因梁漱溟先生与刘湘早有约定，并得到时在南充的张澜支持，遂就便以这批人为主，筹备开办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先是由黄良庸与张俶知起草了《四川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组织大纲》，交省教育厅报省政府批准后，于 1937 年 9 月 1 日公布施行。该馆成立后，黄良庸任馆长，席朝杰负责总务，张俶知任研究实验部主任，教学有大专、中专两种，对民众进行乡村建设方面的培训工作，并于 1938 年兼办川鄂公路路线的战时民众教育。<sup>③</sup>梁漱溟先生当时因其他事务并未与“勉仁斋”同人一起行动，到 1938 年 8 月才前往南充视察民众教育馆开办情况，约半月离开；同年 11 月中旬又再度前往，停留月余亦他往。<sup>[9]</sup>虽如此，四川省立民众教育馆的创设及工作进展仍与梁漱溟先生密不可分，况且，正是有勉仁斋同人迁入四

川，落脚南充办省立民众教育馆，嗣后才有从南充转往璧山和北碚兴办勉仁系列学校的可能，甚而也可说南充民众教育馆

<sup>①</sup>参见《职工活动：总公司请梁漱溟先生讲演》，《新世界》1938 年 8 月第 13 卷第 2-4 期合刊，第 66-67 页。

<sup>②</sup>何吏衡：《四川乡村建设的回顾》，《梁漱溟在北碚》，重庆市北碚区纪念梁漱溟诞辰 100 周年筹委会 1993 年编印，108 页。

乃是兴办勉仁系列学校的先导。

1938年初，教育部提出在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导师制，拟定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提请行政院审核通过，于3月28日正式颁发，作为附件一起颁发的还有《实施导师制应注意之各点》<sup>⑤</sup>。纲要第一条就指出要在中等以上学校施行导师制之宗旨是“为矫正现行教育之偏于智识而忽于德育指导，及免除师生关系之日见疏远而渐趋于商业化”，对此，附件中有更详尽的说明：“我国过去教育，本以德行为重，而以知识技能为次要，师生之关系，亲如家人父子；为师者之责任，非仅授业解惑而已，且以传道为先。自行新教育以来，最初各校犹列修身伦理为教科，而老师宿儒，流风未泯，人格熏陶，收效尚巨。迨至近十余年前，放任主义与个人主义之思潮泛滥全国，遂影响于教育，修身伦理既不复列为教科，而教育功能亦仅限于知识技能之传授。师生之关系，仅在口耳授受之间。在讲堂为师生，出讲堂则不复有关系。师道既不讲，学校遂不免商业化之讥。凡此情形，不仅使教育失效，实为世道人心之患，早为有识者所深忧。”<sup>⑩</sup>这实际上阐明了教育部要实行导师制的社会时代背景。

因为这一在中等以上学校推行导师制的契机，加上导师制所言与梁先生看到现行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也有相合处，即便成为两年后梁漱溟先生与勉仁斋同人筹办勉仁中学的一种缘起。如梁漱溟先生在1940年1月拟就的《创办私立勉仁中学缘起及办学意见述略》中就多处提到导师制，第二点还专门讲“从时弊所至，学生整个生命之身心两方面常见忽视，所受教育零碎偏枯，浅薄无力，纠正之道，在力行新颁订之导师制，而善为发挥之。”<sup>⑪</sup>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缘由，在这篇《缘起及办学意见述略》中都讲得很清楚。

是因为他1938年从华北巡历战地归来，顾念大局艰难，自己无能为力，遂拟退而聚徒讲学。恰好原从山东避到川内的勉仁斋师友团体成员以兴学为请，而他早就观察到社会上的中等教育有待改善，教育当局又恰好新颁在中等以上学校实施导师制，给予了一个改善的契机。故尔兴学以图改善中等教育尽一己之力。<sup>⑫</sup>随后，“兴办中学之议既定，因集同人共商办学所宜注意之点”，方起草为此“办学意见”。并因陈亚三、黄良庸早年曾有过跟随梁漱溟先生在山东、广东办中学的经验，当时又都在四川，即推定这两位于1940年初先行前往璧山发起筹备。后来又增添了王平叔、张俶知等一起筹备。<sup>⑬</sup>此外，梁漱溟先生这篇《缘起及办学意见述略》还提及将设立勉仁书院以作学术研究的意向。“惟昔者主办曹州中学，同时并有重华书院之设，俾同人于教育青年外，兼得自勉于学。今同人亦将作学术研究，而暂不立书院之名，拟先为讲学，以聚四方同志。”<sup>⑭</sup>显然，此时虽无勉仁书院之名，但已有其雏形。

至于会选择在璧山开办，则是缘于勉仁斋师友团体中的钟芳铭<sup>⑯</sup>为璧山人，乃是他从中联系当地支持，梁漱溟先生才会带领大家由南充前往璧山办勉仁中学。<sup>⑮</sup>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40年秋在璧山来凤驿正式开学。学校分设初、高中，初中有两班，高中仅一班。来凤驿东街的川主庙为高中和初中一班教室，西街的一所碉堡底层为初中二班教室，碉堡楼上则为学生寝室与教师办公室，教师住宿则在距来凤

<sup>⑤</sup>①《南充将设省立民众教育馆》，《四川教育》1937年8月第1卷第7-8期合刊，第147-148页；《四川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组织大纲》，《四川省政府公报》1937年9月1日第91期法规之本省法规，第62-63页。参见张俶知《我对漱溟先生思想的领悟——深切怀念漱溟师》、《我入党与梁漱溟办学的一些回忆》（载《梁漱溟在北碚》，重庆市北碚区纪念梁漱溟诞辰100周年筹委会1993年编印，85、92页。

②《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及所附《实施导师制应注意之各点》（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教育部训令第一五二六号训令），载《浙江省政府公报法规专号》1939年第3辑333-336页；另见《四川省政府公报》（1938年5月11日第116期13-16页）之本府训令：为抄发《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及《实施导师制应注意之各点》一份令仰知照由[教字第一四一二号（二七，五，三）]，二十七年四月四川省教育厅印发。

③①钟芳铭，福建闽西武平客家后裔，1902年生于璧山，1927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国文本科。回县后任璧山县中学国文等课程教员。1932年5-9月任山东省立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教员。1934年7月，任巴县乡村建设实验区讲学部导师。1934年8月起任璧山中学、璧山职业学校、璧山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37-1938年任璧山中学校长（此前任教务主任，曾任青木关民教馆长）。1941年任璧山勉仁小学校长。

驿西边五里左右的西寿寺。<sup>[16]</sup>梁漱溟先生亲为董事长，陈亚三为校长，黄良庸为教育主任，张椒知为训育主任，云颂天为初中第二班班主任导师，邓子琴为高中班导师，梁漱溟、熊十力两位先生亦住西寿寺。<sup>[17]</sup>没有独立校舍，教室、办公室、住宿等分散三处，显见是想尽各种办法才勉强凑合。

据当时的勉仁中学学生丁清赋回忆：学校的学生既有璧山当地的，也有附近各县的，还有从沦陷区来的，均要进行入学考试，不合格不录取。每班人数不等，丁清赋所在的初二班有五十来人，梁漱溟先生的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就在这个班。他们穿着朴素，对人和气。梁培宽学习成绩好，见多识广，被称为“小博士”。梁培恕年龄小，有些淘气，喜欢画画，常在作业本上画上几笔，很是与众不同。校长陈亚三的儿子陈道宗，也与丁清赋同班，他是一个山东大汉型的少年，成绩不错。班上还有一个叫释清椿的小沙弥，与班上同学同吃同住，大家也没有把他当外人。<sup>[18]</sup>

1941年秋，勉仁中学迁往北碚金刚碑，其迁建缘由及情况详如下文：

本校原在璧山来凤驿，因校址狭小，不便扩展，乃决迁移北碚金刚碑。今年3月，特请席朝杰先生驻碚筹备，修建校舍，租赁住宅，六月底已粗具规模。暑期开始后，黄良庸、云颂天、富眉生、李渊庭、黎涤玄诸先生均到碚筹划，一面修建校舍，一面进行招生。现在校舍修理部分已经竣工，新建部分因工料困难，且遇暑秋阴雨，须至双十节始能完工。所招新生及插班生，亦符定额。已决定于十月十一、二两日注册，十三日开始行课。

本校负责师友，因筹备勉仁书院，较上年略有变更。校长仍为陈亚三先生，教导主任改为宋乐颜先生，高中班主任导师改聘桑恩亭先生，初中第一班班主任导师为云颂天先生，第二班班主任导师为陈彬如先生，其他教师及工作同仁，亦略有变更。<sup>[19]</sup>

由上可知，勉仁中学由璧山迁北碚的主因是“校址狭小，不便扩展”，另外也是得到卢作孚、卢子英兄弟的支持，卢子英在北碚办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对梁漱溟先生在北碚兴办勉仁学校多方支持，北碚政府并曾资助3万元开办费。<sup>[20]</sup>

在梁漱溟先生主导下，勉仁中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增选《论语》精华作为教材（梁漱溟先生自编讲义上课），让学生了解儒家圣哲的言行思想和修齐治平主张，继承中华文化遗产，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梁漱溟先生曾在讲孝顺父母时给学生教过一首诗：“人生七十强支持，帘卷西风烛半支。传语儿孙好看待，眼前光景无多时。”<sup>[21]</sup>

梁漱溟先生师友团队在璧山办勉仁中学的同时，即以勉仁斋团体为基础成立勉仁书院；其后中学迁往北碚，勉仁书院自然也随之迁到北碚。

1946年8月，仍由勉仁师友成员中的张椒知、陈亚三等人负责，初在勉仁中学后面的缙云山支脉五指山创办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后来迁往勉仁中学明远阁，1948年8月三迁于北温泉附近的松林坡（勉仁文学院现存旧址所在），即在原国学专科学校基础上成立勉仁文学院，自任董事长兼校长。1949年6月方在教育部立案获准。该校宗旨与勉仁书院一样，旨在研究中国文化问题，从认识老中国以建设新中国。学校分设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三系，梁漱溟先生为董事长兼任院长，除梁漱溟先生本人亲自授课外，到1949年冬，尚有陈亚三、邓永龄、罗庸、李源澄、吴宓、杨砺坚、曹慕樊、侯思恭、杨中慎、张之伟、孙伏园等先生在院任教。1949年冬，该校各系二年级以上学生共140余人（当年因故未招新生）。其办学特点与勉仁中学有相似处，如院内成立全院师生院务共进会，并实施导师制及学习小组制。<sup>[22]</sup>此被梁漱溟先生作为大学教育的一种新试验，并为此撰有专文。梁漱溟先生还在1949年写了一篇《勉仁文学院创办缘起及旨趣》，代发刊词载于《勉仁文学院院刊》。他在该文中说：

创立勉仁文学院就是想要汇聚师友共同研究当前的文化问题。因之勉仁文学院首先是有文化研究机构的性质，其宗旨也与早先成立的勉仁书院相同。其不同者，勉仁书院类似研究院，勉仁文学院则更近于普通文科大学，但相比普通文科大学又更为强调文化研究。<sup>[23]</sup>

总之，因有此前起于梁漱溟先生在北大的教学生涯所汇集，后虽辗转多处仍能存续下来的勉仁斋师友团体，方有 1940 年勉仁中学的开办、勉仁书院的创立，以及 1946 年勉仁国学专科学校的创办与 1948 年能进而升格为勉仁文学院。其中与勉仁斋联系尤为紧密的即勉仁书院。

与乡村建设派其他人不同，梁漱溟先生很重视理性在文化教育中的作用，深受儒家理性文化的影响——走教育的路，配合中国传统伦理情谊文化，用新的知识和文化塑造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农村新人。如其早于 1942-1943 年即曾在桂林的《文化》杂志刊发《中国文化要义》初稿第二、三章“理性与宗教之相违”“理性与理智之分别”，皆与理性相关。嗣后，在北碚讲学著书期间，又曾将《中国文化要义》第七章“理性——人类的特征”于 1949 年 5 月率先刊发于《勉仁文学院院刊》，亦可见其办学与著书皆为同一共同目标。

在创办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勉仁文学院期间，学校附近开办有勉仁农场，还曾在中学和学院附设有不定期开课的勉仁农工文化学校，所有这些构成梁漱溟先生在北碚的办学体系。这期间，他提出的办学以研究中国文化问题，认识旧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应是乡村建设的文化教育基础，也与他之前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宣扬并践行的乡村建设目标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梁漱溟先生所主之“勉仁”文教事业并非只有这些，其师友团体成员还曾在其他地方兴办名为“勉仁”的学校。如早在 1938 年，彼时尚未在重庆筹备勉仁中学，潘从理<sup>①</sup>就在四川古蔺办有勉仁小学（初名“勉仁学社”），显然，其得名正是缘于“勉仁斋”；1940 年，杨砺坚在巴县东温泉亦办有勉仁小学；1941 年，原勉仁中学迁走后，璧山来凤驿地方人士乃决定于原中学校舍创办勉仁小学，由钟芳铭主持一切创办事宜，王朝隆任校长，兼办初中进修班。上述三处办学，皆名“勉仁”，其创办者与主要师资皆为勉仁师友团队成员。无一例外，这些学校都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且影响深远。

综上，梁漱溟先生抗战前后在重庆北碚的文化教育活动，对当时北碚乃至重庆的文化教育都产生了相当影响，他注重乡村的社会本位大教育观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 [参考文献]:

- [1]高泳修：《漫游记残》，《现代读物》1937 年第 2 卷（第 33~34 期合刊），第 6~7 页
- [2]《梁漱溟先生应刘湘电请赴川讲演乡村建设理论》，《乡村运动周刊》1937 年第 8 期，第 14 页
- [3]梁漱溟：《我的过去与山东工作概况》（周仁贵记），《新世界》1937 年第 11 期，第 4 页
- [4]《梁漱溟先生在四川讲乡村建设》，《乡村运动周刊》1937 年第 12 期，第 13 页
- [5]梁漱溟：《乡建的三大意义与知识分子下乡》（王永政笔记），《北碚》月刊 1937 年第 12 期，第 1~4 页

<sup>①</sup>潘从理（1899-1950），名远燮，亦字崇理，四川古蔺人。1919 年曾去上海中国公学就读，中途辍学还乡，1921 年出任古蔺县第二国民学校校长。1923 年考入北大哲学系，遂受教于梁漱溟先生并追随之。1928 年梁先生到广东省立一中办学时，曾应邀任教。1932 年，与勉仁斋师友团队中的伍伯镛、黄良庸等在广东番禺县新造乡创办乡民学校，被推选为校董兼校长，从事乡村建设探索。1933 年返乡省亲，遇同窗好友王平叔，被留于巴县南泉乡村建设实验区，任教务主任兼第一实验小学校长。1934 年复返广东番禺乡民学校执教。1934 年到山东邹平任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部主任。1937 年 8 月，应川南师范聘任训育主任，该校并设有乡村师范班，以为乡村建设培养人才。1938 年回乡，在古蔺城郊玉田乡创办勉仁学社，1939 年始更名为古蔺私立勉仁小学，附设初中补习班。1945 年新建校舍后，将原初中补习班改为兴仁中学，原勉仁小学改为中学的附设小学。因立案未获批准，1946 年中学部分并入县立初中，未久小学亦交由地方政府改作中心小学。前后办学约十年。

- 
- [6]梁漱溟：《中西文化的差异》（葛向荣、刘文襄记），《北碚》月刊 1937 年第 12 期，第 5~7 页
- [7]梁漱溟：《我的过去》（心月、德勇、明照合记），《海潮音》1940 年第 4 期，第 3~5 页
- [8]梁漱溟：《思亲记》，《清华周刊》1925 年第 2 期，第 59 页
- [9]《梁漱溟全集》（第八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00~401 页
- [10]《实施导师制应注意之各点》（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教育部训令第一五二六号训令附件），《浙省政府公报法规专号》1939 年第 3 辑，第 335 页
- [11][12][14]梁漱溟：《创办私立勉仁中学校缘起及办学意见述略》，《梁漱溟全集》（第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59~67 页[13]勉仁书院文书股：《勉仁书院讲学旨趣》，《图书季刊》1943 年第 1-2 期合刊，第 207 页
- [15][16]丁清赋：《在来凤驿勉仁中学读书的回忆》，载政协璧山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璧山县文史资料选集》第 7 辑，1993 年，第 56 页
- [17]张志一：《邓子琴“三表”缀佳联》，载《绍炎诗文存续集》，香港日月星出版制作公司，2011 年，第 251 页
- [18][21]傅应明：《梁漱溟与来凤驿勉仁中学》，《重庆政协报》2017 年 11 月 14 日，第 3 版
- [19]《勉仁中学迁移北碚》，《师友通讯》1941 年 10 月总第 6 期，第 4 页
- [20]黎炎：《张俶知先生与勉仁中学》，载政协重庆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 39 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09 页
- [22]《私立勉仁文学院概况》，《北碚日报》1949 年 11 月 4 日，第 3 版
- [23]梁漱溟：《勉仁文学院创办缘起及旨趣》（代发刊辞），《勉仁文学院院刊》创刊号，勉仁文学院 1949 年 5 月编印，第 1 页